新闻与传播评论 JCR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Review
第 72 卷 第 5 期 2019 年 9 月
Vol. 72 No. 5 Sept. 2019. 005-014

DOI:10. 14086/j. cnki. xwycbpl. 2019. 05. 001

《解放日报》“一得书”的批评与监督评析

焦红强

摘　要:1942 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解放日报》开辟“一得书”专栏,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报刊的批评传统,以尖锐而富有理性的批评风格,改变了之前党报批评中的党性欠缺、方法失当、脱离群众和无的放矢等问题,发展了党报批评的理论和实践。“一得书”杂文批评的特色在于贯彻延安整风运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综合运用战斗品格、党性原则、群众路线和建设性思维,强化和改进了党报的批评和监督。党报可从“一得书”中汲取宝贵经验,结合新时代赋予党报的责任和使命,正确处理战斗性与建设性、党性与人民性、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之间的关系,推动党报批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解放日报;一得书;批评;舆论监督;党报

中图分类号:G210. 9;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19)05-0005-10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XW005)

在党报上开展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大型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对党报如何做好批评监督进行了积极探索。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解放日报》第二版开辟专栏“一得书”,刊登谢觉哉撰写的系列杂文。这些文章联系实际对陕甘宁边区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进行揭露和批评,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站在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立场上提出建议和意见。“一得书”栏目克服之前党报批评的党性欠缺、方法失当、脱离群众和无的放矢等问题,为党报正确开展批评监督树立了典范。在当前的融媒体环境下,党报的批评监督面临着诸多误区,从而造成党报舆论监督功能逐渐弱化,与新时代党和人民对舆论监督的要求不相适应。分析“一得书”栏目的特色和宝贵经验,以史为鉴,可使我们对党报的批评监督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推动新时代党报舆论监督工作的创新发展。

一、唯一有效的监督:马克思主义政党报具有批评传统

批评监督是媒体的一项重要功能,马克思曾说,报纸是“唯一有效的监督”[1],他在担任《新莱茵报》主编期间,就主导报纸刊登了大量揭露黑暗、批评政府的文章。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党报上的批评历来十分重视,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时期多次主张,“党的刊物应当敞开大门,以便根据日益复杂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对这些决议进行批评,进行修改。”[2]1919 年 3 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和苏维埃的报刊的决议”上提出:“党和苏维埃报刊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露各种负责人员和机关的罪行,指出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错误和缺点。”[3]把批评监督作为党报的一项重要功能。在江西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报刊都自觉把新闻批评列为报纸的重要职能。如《红色中华》在发刊词中第一条就提出“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4],并开设“苏维埃建设”“突击队”“铁棍”“铁锤”“党的生活”“轻骑队通讯”“生活批判”等栏目,对政府部门及其人员开展了“有错必究、不顾情面、直插要害、酣畅淋漓”的批评。[5]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为了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明确指出报纸要“善于使用批评的武器,表扬

各种工作中的成绩,揭发其错误”[6]。此后,《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等主要党报均刊登了大量批评文章。

从1941年5月创刊到1942年4月改版,《解放日报》上的批评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文艺栏的杂文式批评,二是一般性的工作批评。其中,以文艺栏的杂文批评影响最大。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北平、上海两个文化中心先后沦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成为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心中的圣地,各类知识分子大量涌入,使这个西北边塞小城在20世纪40年代一跃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后,发现他们心目中的圣地却同样存在闭塞、落后和愚昧。这些知识分子多接受过“五四”启蒙运动的洗礼,对“民主”和“自由”抱有崇高理想,延安一贫如洗、文教落后的现实让他们很自然地背负起了文化和思想启蒙的责任。一场批判与启蒙运动开启了,《解放日报》文艺栏正好提供了这个平台。1941年10月23日,丁玲在文艺栏发表《我们需要杂文》,提出“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呼吁要“为真理而说,不怕一切”[7]。之后,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萧军的《杂文还废不得》、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批评文章相继刊发。这些文章运用鲁迅的杂文笔法,以批判和揭露的笔触,指向了延安的落后和所谓的阴暗面。比如批判官僚主义、等级制度;讽刺歌功颂德,揭露问题和阴暗;反对传统文化,突出个人主义;批判蒙昧,治疗精神奴役创伤等。这些文章既不能从实际出发、就事论事,也不谈建设性的意见,而重在揭露、讽刺和批判。他们还强调作家的独立性,认为文学创作不应有政治标准,因而在杂文写作中普遍忽视党性意识。当时,中共中央正在酝酿开展全党的整风运动,努力实现党内的团结和统一,而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栏的作者们却在倡导精英化、个人化、自由化和多样化,引起了中央主要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反对。毛泽东、朱德、贺龙等都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评,要求党报的批评要具有党性和建设性,能够团结同志、鼓舞士气。1942年4月,随着《解放日报》的改版,文艺栏也进行了改进,由文艺专栏改为综合性的文艺副刊,文风才逐渐贴近大众、贴近生活。

在一般性的工作批评中,《解放日报》对边区领导干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也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监督作用,推动了边区工作的改进,但也存在着党性原则不强和方法策略不当等错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党的政策和中心工作贯彻不力,没有与中央保持步调一致;二是联系群众生活不够,批评存在脱离实际的现象;三是批评中过分强调了对被批评者“最无情的揭露和打击”,致使出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倾向。[8]

二、杂文与批评:“一得书”推动党报批评理论研究的深入

需要什么样的杂文,党报上又需要什么样的批评?《解放日报》改版后开辟的新专栏“一得书”给出了回应,专栏作者是被称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笔名焕南)。在栏目开篇前他这样写道:“‘一得书’是取‘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之意。但有时并没有一定千虑,就把它写出,所以也不一定是‘得’。”[9]“一得书”栏目的文章联系工作实际、关注群众生活,内容丰富、议论精辟,有尖锐的批评、更有善意的启发和鼓励,这种新杂文受到了读者普遍欢迎。当时的延安是需要鲁迅式的杂文还是“一得书”这样的新杂文?1942年7月25日,《解放日报》第四版刊登金灿然的文章《论杂文》,从“杂文是干什么的”“杂文的时代问题”“杂文的讽刺”等三个方面进行了长篇论述。作者认为,“一得书”的杂文是值得推崇的,那材料的丰盈,内容的坚实,都是杂文的新格,指出了杂文的一条广阔新途径。而延安的现实与鲁迅时代的国统区已大相径庭,鲁迅式杂文已不能适应当前政治形势的需要。[10]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对“鲁迅杂文笔法”进行了回应。他说:“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

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11]毛泽东强调,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和缺点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开展批评,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批评,而不能像对敌人一样冷嘲暗箭。

为了推动党报批评的正确开展,《解放日报》刊登了多篇文章予以阐述。4 月 2 日,报纸第一版刊登了《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顿三风要利用报纸》的文章,对不正确的立场和方法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说:“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绝对平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12]。这就告诫党报的同志要与中央保持步调整齐一致,在开展批评中强化党性原则和立场。4 月 6 日第一版刊登的社论《自我批评从何着手》强调了批评要注重方法:“真正坚强的自我批评需要方法,需要首先充分懂得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同志演说的实质,需要思想上精神上郑重的准备。”要“认的放矢”,对于“的”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否则“既无党性的常识,又无唯物论的嗅觉,只以交游中的传闻为调查,以窑洞中的感想为政策,不求甚解而自居先觉”[13],就不能做好批评。这篇社论深刻揭示了开展批评的基础,把提高党性常识、进行深入调查列为必要前提。接着,4 月 11 日《党的生活》栏目刊登师鲁的长篇文章《关于批评方法问题的研究》,分析了批评别人的方法和接受别人批评的方法,文章还特别强调批评要站在党的立场进行,如果“从爱护帮助同志的观点上出发去对待同志,结果会造成党内‘尔诈我虞’,会造成同志之间玩弄手腕的风气”[14]。这是要坚决反对的。除此之外,5 月 21 日还刊登了王凯的文章《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应取的态度》,分析了批评者应采取的八种态度和被批评者应采取的五种态度,并称:“如果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采取上边(以上)的态度,那么批评就成了无产阶级政党促进团结与进步的武器。”[15]这些文章对如何开展批评的讨论已经上升到了理论分析高度,既强调了开展批评的前提和基础,又分析了正确开展批评的方法和态度,而坚持党性原则是一切批评的基本立场。这些理论分析不仅对整风运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进行指导,同样也是对党报上的批评进行匡正。

三、转型与突破:“一得书”杂文批评的实践和特色评析

1942 年 4 月 1 日,《解放日报》刊登《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提出:“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就要有适当的正确的自我批评,表扬工作中的优点,批评工作中的错误,经过报纸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16]4 月 9 日,“一得书”栏目即在《解放日报》第二版刊出,到 11 月 23 日共刊登杂文 70 篇。[17]文章涉及政府工作、文风学风、社会问题和国内国际政治评述等,其中批评是主流,占到 66.7%。这些文章大多短小精湛,富有战斗性和说理性,文笔生动、通俗易懂,深入群众、有的放矢,推动了党报批评的转型。

(一)“一得书”推动党报批评转型的实践

“一得书”杂文批评的转型并不是改变批评风格、回避矛盾和问题,更不是歌功颂德、迎合政治宣传需要,而是直面工作中的各种弊病,旗帜鲜明地开展批评、指导工作。

1. 批评工作作风,言之有物、有的放矢

批评工作作风是“一得书”栏目的重点内容,一共有 15 篇文章,批评往往振聋发聩,切中要害。如《把胫骨硬起来》,根据报上刊登内容说“市政府职权低弱,党、政、军、学人员藐视市府法令”。文章鼓励工作人员要敢于执法,对于不尊法令的“要给他些钉子碰”“硬起胫骨来”“做的几次,威信建立了,人们的习惯也就逐渐养成了”[18]。《为什么搬? 搬哪里去?》则批评一些区干部工作开展不扎实,没有很好解决民生问题。《客多于主》《不应该吃白饭》批评上级对下级管得过多,影响了基层单位的正常工作,干部到基层调研不付餐费,增添了基层的接待负担。《大问题》提出了春耕中的问题,批评政府的工作与实际结合不好,没有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建议政府举一反三,统筹解决问题。针对边区征收救国公粮中的干群矛盾问题,《边区人民的生活》的文章引用一位同志的日记,借以批

评边区部分干部工作浮漂,没有充分认识到民力的重要和百姓生活的艰辛。“我们决不能看到人民勉强可负担,就不替人民想法子减轻,甚至还以为加点子不要紧。”作者强调说:“没有取之不穷用之不竭的民力源泉,就无法取得最后胜利。”[19]

2.批评文风学风,贯彻延安整风精神

整顿文风和学风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点,“一得书”针对“党八股”、学习中的主观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释八股》从八股的历史典故和现实危害入手,提出:“应该是澄清的时候了,在文风上,最后一次宣布八股的死刑!”[20]《一语之差》批评工作人员在写作中不尊重事实,造成错误和引起误会。《关于写字》批评有的同志写字不认真,龙飞凤舞,“发誓不要人看清”,要求同志们注重文字是交流的工具,写字应认真工整。对于学风中的问题,“一得书”用了10篇文章进行批评。《应该“熟”而又“深思”》《就文件讨论文件》《为边府墙报写》批评有些参加整风的同志不认真学习22个文件,在学习中不求甚解、应付差事。《拂拭与蒸煮》则引用《联共党史·结束语》开篇,借用哲理名句来批判学习中的主观主义,提出:“不能够主观地把自己看作‘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而应该自己责备严,‘时时勤拂拭,不使染尘埃’。”[21]《复原野农同志信》则通过正确解读《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文件,指出干部在学习毛泽东讲话精神中存在教条主义错误:“毛主席并没有对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下命令”“而是要你找着方向去发展,而不是一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就象吞了灵符一样:‘未卜先知’。”[22]

3.直面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陕甘宁边区在当时代表着进步、开明,被称作是党领导下的“新社会”,但也存在不少社会问题,“一得书”并没有刻意回避。根据来信反映农村的封建迷信活动坑害群众,《农村里的“耗子”》的文章进行了深刻批判,指出了封建迷信的巨大危害,并给边区政府提出了改进建议。《探卖粮》以一首小诗开篇,批评了社会上对农民极不人道的高利剥削,并指出这是剜老百姓“心头肉”的大事,应该想尽办法替群众解决这个问题。《娶不起老婆》则痛批农村出现的买卖婚姻现象,详细分析了其中的四条原因,并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法令——禁止买卖婚姻。《关于减租》和《缠讼》则反映了边区的阶级矛盾,虽然在抗日统一战线背景下的“三三制”原则缓和了阶级矛盾,但地主富人与农民之间仍然存在矛盾,有时还可能会激化,作者对此提出批评并给出了解决的办法。对于社会上不正确的舆论导向“一得书”并未附和,而是注重批评和加强引导。如《菜地问题》针对部分群众对政府的政策不理解,认为延安市府命令“义务分租”,侵犯了人民自由处置财产的权利,作者为此从四个方面深入批评群众的错误观点,认为市政府的决定是合情合理的。《乡干部并不多》针对一些群众说“乡级干部太多了,应该减少一些”。作者指出,“乡的干部几乎全部是民选的”,乡干部也都是为大家做具体事情的,因此,“我觉得乡级政府倒无所谓简政不简政”[23]。

4.表扬鼓励典型,注重引导社会舆论

除了开展批评,“一得书”也有对边区工作中的创新做法进行表扬和倡导,对革命同志的牺牲表达深切的怀念,注重发挥舆论引导作用。《语必惊人》表扬边府党团给边府总支的信“生动泼辣”“有起伏”,同时“眼睛向下”“耳朵向下”,用词新鲜。最后总结:“语的惊人,不止在于使他骇一跳,而是在骇一跳之后,能够在他意识里长留印象,在他行动里得到反映。”[24]《新的月旦》指出乡参议会的议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工作“率真”,对他人不知道恭维,对自己也不知道遮掩。《怎样做县长》里面没有批评,而是充满了鼓励,通过连载五篇文章来结合工作实际教育干部,勉励他们“不能仅仅象古时的清官‘请问下民’就够,而要和民众打成一片,才能领导和提高民众,使政治能飞跃地上进。”[25]《忆叔衡同志》《哭凌波同志》中,对革命同志的牺牲进行了深切的悼念,通过追忆他们的革命生涯和事迹,高度赞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

毛泽东十分关注“一得书”上的杂文批评,《哭凌波同志》一文刊登后,他给谢觉哉写信道:“死者

已矣,生者务宜注意。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极宜有所调节,文章亦不可写得太多,请加考虑为盼。”[26]

(二)“一得书”杂文批评的特色评析

“一得书”杂文批评的特色在于继承党报的批评传统,结合延安整风运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综合运用战斗品格、党性原则、群众路线和建设性思维,实现了党报批评监督功能的强化。

1. 切中要害、毫无保留,强化战斗品格

党的机关报要具备战斗性,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党报品格。《解放日报》改版社论这样说:“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27]为了贯彻“战斗性”,“一得书”的批评直插要害、切中时弊,言语辛辣、毫无保留。例如,《感性与理性》痛批教条主义:“如果只记着前人所抽象出来的知识,不去实证,‘机械地由一种条件搬到另一种条件去’;或者拿着前人所抽象的做依据而更抽象一下,离题越远,错误越多。这样的理论,如只放在案头上摆样,虽然‘比屎还没有用’,不能肥田,不能喂狗,但狗屎‘自享’,与人无干。若拿了去对付革命,那就危害匪浅,‘容易把革命弄坏’。”[28]反对党八股是延安整风的三大任务之一,在《读宣传小册和反对党八股随记》中有几处痛批:“比如说要严防‘左倾’,紧接一句:‘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撑得好好地,而甚么是左或是右的具体事实,却在文章上看不出来。”这样面面都说到,但又面面都不戳穿的八股文,作者建议写文章的人“最好藏拙”。而对于长篇大论的文章,作者则批评说:“文章以短为贵,可一气读完,即令于人无补,也耽误工夫不多——少造些孽。”[29]这些文章直面现实、针砭积弊,严厉而尖锐,即便在7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批判意义。

2. 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充分贯彻党性原则

“一得书”中所包含的强烈的党性意识,源自作者的特殊身份。谢觉哉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他的党性原则极强,能够深刻理解中央的意图和政治风向,并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其所写的杂文在政治上能够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充分贯彻中央关于整风的意图。谢觉哉的这种党性觉悟来自革命事业的长期磨炼。他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1926年初即担任中共刊物《湖南半月刊》主编,之后曾先后任《湖南民报》《大江报》《红旗》《工农日报》等主编,对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十分熟悉,又具有丰富的办报经验,能够熟练运用政策在报纸上开展批评,拿捏分寸恰到好处。1939年后,谢觉哉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西北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等职务。[30]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历练中,谢觉哉的行政管理能力、政策法律水平在党内处于较高地位。在开展批评的过程中,既能够讲党性、讲政治、讲原则,又善于将各种矛盾问题进行透彻分析,辨别不同性质的矛盾,自觉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开展批评。即便如此,“一得书”上的有些文章还是征求了中央领导毛泽东的意见[31],可见其党性原则的贯彻。

3. 关心群众利益,发扬密切联系群众作风

“一得书”的批评文章与普通群众关系密切。首先,从内容上看,关心群众利益的批评居于主导地位。据笔者统计,涉及群众利益的批评共有19篇,占46篇批评性文章的41.3%。最典型的文章如《为什么搬?搬哪里去?》《探卖粮》《大问题》《记一位女教师同志的谈话》《娶不起老婆》《农村的耗子》《不应该吃白饭》等。这里边既有批评政府工作不深入,给民众生活带来不便与伤害;又有揭露当时的社会问题,批判落后愚昧现象;更有关心群众疾苦、反映群众的心声,替群众仗义执言。其次,从问题发现的途径看,密切联系群众。引起作者开展批评的事实来源有四类:一是群众来信,二自身调研,三是工作报告,四是报纸新闻报道。而以群众来信和自身调研为主要渠道,这就说明作者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从而能及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第三,从解决问题的态度上,对群众饱含深情。作者批评的问题中,有的涉及政府工作的不足,他站在群众立场上给政府提出建议,要求马上解决;有的是一时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他提出建议鼓励边区政府坚持不懈,长期关注予以解

决;有的甚至是大家所认为的小事,但作者也举轻若重,分析里面的大问题。

4.富有使命感和担当精神,突显建设性思维

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思维中从不排斥建设性思维,“它在批判着什么的时候,总是会蕴涵着要建设什么。”[32]因此,建设性是批评的目的和归宿,没有建设性就会削弱批评的权威性。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谢觉哉富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把批评的目的定位于推动问题的改正上。在文章中,他总是引用丰富的知识开展精辟的议论,并循循善诱予以启发,给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如在《不近人情》的文章中,他引用一位镇上同志的来信,批评边区法庭以“尊重风俗习惯”为说辞,对两起民事纠纷进行了不恰当的判决。文章认为:“所谓习俗,一是本有道理,合乎当地当时民众的要求;二是民智未启,迷信太深,不能不暂时迁就。虽然如此,(法庭)仍应该尽可能使民众前进,而不应向落后投降。”文章还对两起案件的事实进行了认真分析说理,提出应如何在法律和习俗之间权衡的问题。“合乎人情的习惯,既是法,应尊重;且可采入到正规的法上来。”“不大合乎人情而以某些原因,未能即除去的习惯,应该用教育和行政的力量,使之渐变;至于一般人已甚不以为然的习惯,那就应用断然手段,把它割掉。”[33]“一得书”这种建设性的批评说理深刻、透彻,不仅能够让被批评者得到警醒,认识到错误的根源,更能让其获得改进的启示,对推动工作大有裨益。

四、职责与使命:“一得书”对新时代党报舆论监督的启示

《解放日报》批评的转型是在改版过程中进行的,“一得书”在这个过程中用鲜活的实例阐释了党报批评的正确立场和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多次发文明确党报的批评职能,如1950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开篇即指出要“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34]1956年中共中央又颁布了《进一步开展报纸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强调:“报纸批评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党和国家工作中的缺点,而不是一般劳动人民”[34]。1954年4月毛泽东在对宣传工作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提出:“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35],进一步指导报纸批评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提法在党报上的使用频率逐步降低,逐渐被一个更具时代感和概括力的概念“舆论监督”所代替。[36]但在一般情况下,“党报的批评”和“党报的批评监督”仍被使用。随着互联网媒体的兴起,党报的批评监督受到了来自网络舆论环境的挑战,学界对新闻舆论工作的研究更加深入,舆论监督不仅在党的新闻工作中呈现极高的关注度,而且已上升到党的政治生活高度,从中共十三大到十九大,“舆论监督”都被写入党的报告。[37]当前,我们正跨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为了担负起应有的职责和使命,党报应借鉴《解放日报》批评监督的成功经验,并依据新时代的特点,从战斗性与建设性、党性与人民性、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的“三统一”出发,实现新闻舆论工作的创新发展。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最新要求,更是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的现实需要。

(一)贯彻战斗性与建设性的统一

同70多年前相比,党报所面临的社会形势和环境发生了巨变,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要正视矛盾和问题就需要继承“一得书”敢于批评的战斗品格。当前,党的各级媒体上充满了暖新闻,批评性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少,一些地方干部害怕所谓的“政绩”被媒体的批评所“抹杀”,搬出了“正面宣传为主的政策”的挡箭牌,对批评性报道冠以“负能量”的标签。习近平指出:“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38]党报的批评监督也是“正能量”,党报若不敢批评、不会批评、不懂批评,甚至放弃批评,那么我们的社会将会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瞭望哨”,当危险来临所有的批评和警示都可能为时已晚。正如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审判案》中所言,“只有当揭露已经失去任何意义的时候,才能进行揭露”[39],媒体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假若党报没有战斗的品格,一味地讲究一团和气,假以

时日就会“造成一种脱离群众和报喜不报忧的媒体印象”[38],将会使党报失去公信力。与此相对应,网络自媒体的批评声音引起了广大网民的高度关注。虽然这些网媒的作者多数既非专业的媒体人士,又无党性意识的约束,其批评和评论存在诸多问题,但网民认为他们敢于针对热点问题进行回应和批判,而对于他们的批评是否客观、是否科学已不那么关注了。互联网是当前面临的“最大变量”,根本原因在于党报尚不能快速适应媒体格局的新变化,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网络时代批评监督的新要求。为了把控这个“最大变量”,就需要党报进一步树立战斗的品格,充分担负起网络媒体环境下的舆论监督责任,牢牢掌控批评的话语权。

党报批评坚持战斗性,不是要回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立场,而是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做到战斗性与建设性的统一。“一得书”的批评虽然很尖锐,但是批评和揭露之后,作者总能实事求是、满腔热情地提出建议。没有建设性的批评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容易成为大字报式、口号式批评,不仅对推动工作没有帮助,甚至会带来一定的混乱,延安时期的墙报运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字报都是典型的教训。党报如何做到批评既言之有物又言之成理?关键在于深入调查和研究问题。只有把调查研究工作扎扎实实做好,才能在批评中底气十足、切中要害,才能够举一反三、找准出路。坚持战斗性与建设性的统一还应该注意批评的方式,既要让被批评者出出汗、红红脸,受到警醒,又要团结他们调动其改进的积极性。毛泽东曾说:“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40]直到今天,尖锐的、诚恳的、坦诚的批评仍应为党报所坚持。

(二)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列宁首先将党性原则与党的出版事业联系起来。1905 年 7 月,列宁在《〈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中提出:“党的一切出版物,不论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须绝对服从党代表大会,绝对服从相应的中央或地方党组织。不同党保持组织关系的党的出版物不得存在。”[41]1905 年 11 月,他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全面论证了党的出版物的党性原则。他说:“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41]在《解放日报》改版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强调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原则。他说:“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42]党性原则就要求党报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不能有任何独立的言论;要求党报的编辑记者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恪守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传播党的声音。“一得书”在党性意识上为党报批评做出了表率,那就是坚定不移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与中央关于《解放日报》改版的要求和整风精神保持高度一致。例如,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要反对“党八股”和主观主义的学风,“一得书”即通过 17 篇文章予以重点关注,通过典型事例和理性的论述开展批评,推动了文风学风的转变。为了配合边区政府开展的社会文教活动,“一得书”运用 14 篇文章来批评社会愚昧问题,推动社会进步。新时代的党报工作者要做到坚持党性原则,首要就是认真学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把贯彻党中央的精神作为第一要务,以“政治家办报”的标准来激励自己,努力做到既讲党性,又讲政治。

在批评中坚持党性并不排斥人民性,而是要做到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价值体系中,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统一的。1944 年《解放日报》在《本报创刊一千期》的社论中就提出:“我们的报纸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是人民大众的报纸。”[43]1947 年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3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也都强调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的,这成为党报的一条基本准则。“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根本在于党和人民的关系是一致的、

统一的。”[38]开展批评性报道不是要在党和人民之间进行立场上的站队,而是要努力把党的意志和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际工作中,党的各级组织在具体工作中出现脱离人民、损害人民利益时,党报批评监督的目的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上升为党的意志,实现好两者的统一;反之,当部分群众的短期利益诉求与党主张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冲突时,党报要批评教育这些群众,引导他们兼顾长远利益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批评的目的不是要给党和政府找麻烦,而是要把党的政策与人民群众的诉求有机结合,最终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几年前,个别干部针对党报开展批评监督甚至反问:“你是替党讲话,还是替老百姓讲话?”这种将党性与人民性对立起来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党报应给予有力驳斥。习近平曾说:“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割裂起来,在思想上是糊涂的,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38]因此,党报在开展批评的过程中,要深刻把握党性与人民性统一这一基本准则。

(三)抓好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的统一

1942年毛泽东为《解放日报》“三八”国际妇女节特刊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抓好舆论监督工作也需做到深入群众、有的放矢。“一得书”正是贯彻了群众路线,从群众来信、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从而开展了下接地气、上有高度的批评监督,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而《解放日报》文艺栏的杂文批评则是另外一种景象,以丁玲为代表的“文抗派”大都处在一种与现实生活脱离的状态:“在窑洞里住着,脱离群众,不知道群众的吃喝生活,感情也有距离。”[31]因此,他们所写的杂文式批评只能是脱离群众、言之无物的国民性批判。“只以交游中的传闻为调查,以窑洞中的感想为政策”的做法,是不能够做到正确的批评与监督的。新时代的党报必须借鉴《解放日报》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开展舆论监督。然而,强调批评监督应根植于基层群众,绝不是要一切都听群众的、一切都依照群众的意见开展批评。从群众立场上反映出来舆论观点,有时是正确的、有时是不完全正确的,党报不能不加鉴别地开展舆论监督,而要通过分析和鉴别,用正确的观点引导舆论。“一得书”中的《菜地问题》《乡干部并不多》两篇文章,都是针对群众中不正确的舆论声音进行驳斥,实现了党报对舆论的正确引导。

在新时代互联网融媒体环境下,深入群众必然包括深入互联网倾听网民声音,追踪网络舆论动向、适时开展舆论监督。在这个过程中,党报应深入调查并努力鉴别网络舆论声音,区分正确的舆论和错误的舆论。针对正确的舆论声音,党报要发挥好自身的影响力和权威性,通过深入调查和正确分析把舆论监督工作进行到底;对待不完全正确或者错误的网络舆论声音,党报要有勇气以客观的事实和深入的说理分析予以驳斥,消解错误的声音和论调,从而把不正确的舆论声音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有学者认为,在网络新媒体时代存在“两个舆论场”的现象,[44]即以党报和官方媒体为代表的“主流媒体舆论场”,和以网络新媒体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两个舆论场存在冲突和矛盾,需要开展良性互动,努力实现融通和统一。笔者认为,如果“两个舆论场”的现象存在,那恰是因为以党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没有很好地融入网络媒体环境,没能充分展示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力。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是新闻舆论工作的“两只手”,舆论监督主要是分析问题、开展批评和提出建议,侧重于反映问题并引导社会舆论;舆论引导则主要是把党和政府为解决问题所开展的工作向群众解读,侧重于正面的宣传和引导,两者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但舆论引导不排斥舆论监督,舆论监督不能偏离舆论引导,两者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形成正确的舆论。在互联网融媒体时代,各种不同的声音相互交织、相互转变,舆论声音无时不在变换当中,因此,党报要时刻注意舆论动向,在监督和引导之间做出审慎选择和调整,将两者有机统一起来,牢牢站在舆论的制高点。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72.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第19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第二版):194.
[3] 赵耀宏,薛琳.《解放日报》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3.
[4] 本报编辑部. 发刊词. 红色中华,1931-12-11
[5] 陈信凌. 江西苏区报刊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89-192.
[6] 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 共产党人,1941,19:17-19.
[7] 丁玲. 我们需要杂文. 解放日报,1941-10-23(4).
[8] 李文. 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83.
[9] 焕南. 一得书. 解放日报,1942-04-09(2).
[10] 金灿然. 论杂文. 解放日报,1942-07-25(4).
[1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72.
[12] 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顿三风要利用报纸,批评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办法. 解放日报,1942-04-02(1).
[13] 自我批评从何着手. 解放日报,1942-04-06(1).
[14] 师鲁. 关于批评方法问题的研究. 解放日报,1942-04-11(2).
[15] 王凯. 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应取的态度. 解放日报,1942-05-11(4).
[16] 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 解放日报,1942-04-01(2).
[17] 延安《解放日报》合订本(2-3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18] 焕南. 把胫骨硬起来. 解放日报,1942-04-09(2).
[19] 焕南. 边区人民的生活. 解放日报,1942-06-14(2).
[20] 焕南. 释八股. 解放日报,1942-05-13(2).
[21] 焕南. 拂拭与蒸煮. 解放日报,1942-06-23(2).
[22] 焕南. 复原野农同志信. 解放日报,1942-09-30(2).
[23] 焕南. 乡干部并不多. 解放日报,1942-09-25(2).
[24] 焕南. 语必惊人. 解放日报,1942-04-13(2).
[25] 焕南. 怎样做县长. 解放日报,1942-08-22(2).
[26] 王敬. 闪光的晶石——读谢老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杂文《一得书》. 新闻研究资料,1980,1:9-15.
[27] 致读者. 解放日报,1942-04-01(1).
[28] 焕南. 感性与理性. 解放日报,1942-08-10(2).
[29] 焕南. 读宣传小册和反对党八股随记. 解放日报,1942-09-23(2).
[30] 中国政府网. 谢觉哉. 2008-12-16. [2018-09-15] http://www.gov.cn/gjjg/2008-12/16/content_1179241.htm.
[31] 韩晓芹. 体制文化的生成与现代文学的转型——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的文学生产与传播.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353.
[32] 刘家俊. 试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所显现的建设性思维.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0,6:56-61.
[33] 焕南. 不近人情. 解放日报,1942-08-04(2).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5;117.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222.
[36] 丁柏铨,双传学.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与实践.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104.
[37] 沈正赋. 舆论宣传·舆论监督·舆论引导: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发展进路研究. 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2:11-23.
[38] 新华社通讯社课题组. 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要论.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105-108;108;71;70;73.
[3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280.
[40] 王敬. 延安《解放日报》史.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34.
[4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第1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第二版):155;93.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140.

[43] 本报创刊一千期. 解放日报,1944-02-16(1).
[44] 陈芳. 再谈“两个舆论场”——访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 中国记者,2013,1:43-46.

Criticism and Supervision of the Column of "Yide-Book" in "Liberation Daily"

Jiao Hongqiang(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 1942, the "Liberation Daily" opened a column on "Yide-Book",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 of criticism of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nd using a sharp and rational criticism style, it has solved the problems of lack of Party spirit, improper methods, separation from the masses and aimlessness in the criticism of the Party newspapers before. And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Party newspaper criticism have been develop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ssay criticism l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learning from past mistakes and saving people from illness", and the comprehensive use of combat character, party spirit principle, mass line and constructive thinking, thus realizing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nd supervision of the party newspaper. The Party newspaper can draw valuable experience from the "Yide-Book" and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ghting and constructive, Party spirit and people character, supervision of public opinion and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upervisory responsibility entrusted to the Party newspaper in the new era,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party newspaper criticism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Liberation Daily"; "Yide-Book"; criticism; the thought of public; party newspaper

---

■**收稿日期**:2019-03-12
■**作者单位**:焦红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责任编辑**:刘金波